

【个人记忆】

和关德栋先生同宿舍近四年的日子

□黄清源

1970年“文革”期间,山东大学文科迁来曲阜,与曲阜师院合并组建新山大。当时两校均无学生,但突然拥进几百名职工,首先由曲阜师院教工宿舍造成很大的压力。那时我是曲阜中文系助教,住在约二十平方米的单身教工宿舍,合校时又安排进了两位山大教师。一位是教现代文学的青年教师王长水,他现在已是著名的书法家;另一位五十多岁,是教古典文学的关德栋教授。教授和两个助教挤在一间屋里住,只有那种特殊的时期才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

关先生是满族,原姓瓜尔达,汉姓关。迁校时臧乐源老师编了个顺口溜,头两句是“山东大学一分三,济南曲阜与泰安”。关先生的爱人在山大生物系,随系迁到泰安山东农学院,孩子在曲阜下乡,因此关先生也成单身。半年之后,长水的爱人调来,他搬了出去。1974年山大文科迁回济南,算来我和关先生同宿舍近四个年头。

听山大青年教师传言,关先生29岁即成为教授,学问有多深摸不清,因为他搞的大家都看不懂。他通梵文、满文、民俗学、敦煌学,梵文、满文国内已没有几人能识读。搞民俗学还搞出大麻烦来。因研究东北民俗,他和有关苏联专家有交往,“文革”开始山大红卫兵说他“苏修特务”,对他几番批斗。和关先生熟了之后,从闲谈中大体知道了他的主要经历。他北大毕业,解放前在北京、上海佛学院教书时学了梵文。他说,不懂梵文没法读通印度哲学。建国后经郑振铎介绍到兰州大学,后转福州大学,再到山大。

我问关先生满文还有什么用。他举了个例子:清政府有个部级单位理藩院,掌管蒙西藏边疆民族事务兼办对俄外交,文件全用满文书写,现故宫中堆积甚多,称为满文老档,是清代民族史、边疆史、外交史以至涉及边疆问题的原

始资料,但能看懂者已寥寥,满文老档成了死档,急需译成汉文。关先生说,连德国都有德满词典,中国却没有汉满词典。我见他成年累月用软包烟盒纸做卡片,积累满文词条。一个人想搞部汉满词典是大工程,甚至需毕生精力,那时又无资助,全凭关先生的自我责任心。除政治学习外,他足不出户,日以继夜,山大青年教师戏称他是发誓要坐烂几把椅子的人,连信件也由我从资料室捎来。最常见的是复旦大学赵景深的来信。赵景深研究古今通俗文学的著作甚丰,估计是同关先生讨论民俗学问题。

常来我们宿舍找关先生的是殷孟伦教授。有一年,当时名满全国的批孔老将杨荣国教授来到山大,杨披着军大衣,跟着几位解放军,经过我们宿舍。一群学生、青年教师在路边看,随着走。我回到宿舍,见殷孟伦先生也在。我说:杨荣国到咱门口了,不去看看?关先生正和殷先生讨论李白出生地碎叶问题,谈兴正浓,毫不理会。高兰教授有时也来找关先生,在这里他也是单身,搬箱子找衣服都得找人抬,更别说往屋里运烤火煤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和关先生马上去帮忙。

关德栋先生比我年长二十来岁,但我们相处融洽。夜晚熄灯长谈,关先生谈满文老档,谈土耳其,谈图理琛,谈北疆民俗风情,都是我闻所未闻的知识,开阔了我的眼界,在“文革”年代,愈感新鲜。后来我以此为线索看了些资料,还发表过几篇文章。对我来说,这些知识领域的启蒙者,是关先生。我们有时也谈些生活琐事和趣闻。关先生说他在福建时,一位地理系教授以认

识一位高僧为荣,他拿这位高僧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关先生看。文章中有一段谈到,受他一位老师的鼓励,解放前他到了西藏,后来还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关先生当时笑着说:“你知道他说的这位老师是谁吗?不才就是



▲关德栋先生

我!”这位地理系教授大感意外。

关先生生活十分俭约,说来使人不信。他的一床薄被,还有小补丁,铺的是装单衣的大布袋。冬天床头用报纸挡风,到了春天也不拿掉。那时宿舍没暖气,有一天很冷,我说:我有件棉大衣,您盖吧。他说不用,再冷时他有雨衣。一开始我不太理解,后来逐渐明白,关先生的心思全在他的学术和满文研究上,对生活几乎没有需求,或者说漠不关心。有一年寒假回家,关先生先走的。我怕小偷夜间进来,想了一招:扯了根绳子拴在脸盆架上,另一头系在对面的床头。设想要是小偷摸黑进来,将绊倒盆架摔响脸盆惊动四邻。等我从家里回来,见关先生正埋头看书,所谓“机关”依旧,也不嫌进出不便。我急忙

拆除并向关先生说明我的防盗思路,关先生笑了笑说很好,并不在意。那时我自学外语,有时在宿舍朗读,问关先生是不是影响他,关先生说没事。他沉浸在所研究的课题中,专心致志,真正做到了听而不闻。这种境界我一辈子都别想达到。

“文革”后不久,有一年我到济南出差顺便去山大宿舍探望关先生。关先生很高兴。他说因他与一位苏联民俗专家有来往,“文革”初受到批斗(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这件事),现在这位专家又来了,有关部门主动让他接见。又说他作为特邀专家,最近应邀到几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我深感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学术领域。又过了一两年,我在一本天津的学术刊物上看到朱星同志的一篇文章,谈到关德栋先生已经不在,我十分震惊。不久,关先生的孩子来找我,我吞吞吐吐地打听他父亲的情况,他笑着说:“你看了朱星的文章了吧?这是个误会。我父亲借调到故宫博物院教满文培训班去了。朱星曾来电话找我父亲,山大的同志说不听,他以为真‘不在’了。”我听后也笑了。又一年,我到济南参加高考阅卷,晚上去看关先生。关先生说,“这之前我还‘不在’过一回。”他找出一篇日本学者谈敦煌学的文章指给我看,文中说“闻关德栋先生逝于‘文革’,遥望西天”如何如何,这消息不知从哪里来的,却反映了关先生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我问他满文培训班的情况,他说整理满文老档是周总理生前交代的任务。培训班原来的教师是从新疆调来的,锡伯族,八十多岁了,还是位盲人。他受不了北京的气候,回去了,关先生于是来接替他。从中也可见懂满文的人才之缺和培养接班人之急迫,关先生这方面的特长得到发挥了。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像我们做黄金销售的,也需要每天与不同的客户打交道。其中,联系最多的,当数国内那些有着贵金属销售资质和能力的各大银行。

正是初冬,我和领导K小姐因为某银行的贵金属加工招标业务来到北京。一下火车,我便被首都湛蓝的天空吸引了眼球。那几天的北京,正在2014年APEC会议期间,不仅车辆限行、供暖推迟,就连大排档都彼此错开了营业档期。为此,中央领导都感慨说:“好在人努力,天帮忙,这些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

因为初入市场,这次投标算是我的“处女秀”,因此,我从头到尾都准备得严肃而庄重,比如说这大冷的天,我仍穿了笔挺的制服西装。久经沙场的K小姐却见多不怪,一边笑我的过于郑重,一边给我减压:“投标没有你想象的

【黄金销售手记之四】

黄金企业也凭薄利多销

□奚凤群

那么复杂,也没有内幕种种。放轻松,只要有过硬的品牌质量和产品服务,中标不过分分钟。”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又问道:“那咱到底能不能中标呀?”

“虽说这结果是王道,可是过程更重要。就像爬山,山顶的风景肯定不及沿途的美。而且,该来的一定会来,是你的,别人也抢不走。再说了,国内能被银行资格审查通过且准入这贵金属加工业务的黄金企业,就那么几家。而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通常情况下,都是几个业务包一起招标。所以,大部分投标企业基本上都能分得一杯羹,无非是肉与汤的比例多少而已。银行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为了压价;二是为了风险的分散。谁都不傻,谁都不会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对吧?”

我的担忧其实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银行此次发布的三个业务包,我们企业能做的,只有新工艺金条加工业务。我好歹也是业内人士了,大体知道和银行合作的价格区间,利润微薄到全凭薄利多销。当然,按每年加工的金条以几十吨来计数的时候,即使每克只赚几毛钱,这利润也是极其可观的。可是,这么多人齐上阵,喝汤和吃肉,滋味肯定会大不相同。

招标很快开始,先是各企业递交投标文件,呈交投标的产品样品、包装,接着便是述标。正如K小姐所言,因为行业内都是这些企业在同场相竞,所以,稍有些许,大家伙便火热地聊成一团,“你家投的哪个业务包?”“你家的工艺是自家工厂研发的,还是南方工厂代加工的?”“你家加工费报了多少?”“上次那个银行的投标,怎么没有结果,你们接到中标通知了没有?”

及至各家企业呈交的产品又被现场领回,等待的间隙,现场参与招标的企业代表又开始了新的交流互动,“刘总,你们说得大专业了,也一针见血。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评标的那些专家,我敢保证,既看不出你出的这款产品好在哪里,也看不出它不好在哪里。”有两家黄金企业因为观点不同,起了争执,便有和稀泥者,上前搭建着台阶。

“这次的加工费我们已经报得够低的了。可刚才银行问我们,说这次是竞价谈判,彼此便都应该有让步的余地,说他们认为加工费还可以大幅下降,他们还给了一个底价,但我当场坚决回绝了他们。我们这些靠加工费活着的企业,守着金山却赚不回金饭碗,这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了大牙?”似乎在竞价谈判里受了委屈,一家黄金企业发起了牢骚。

“对对对,我建议,下次银行再招标的时候,我们私下都通个气,把各家的加工费都摸遍底,大家统一口径,一个价格对外。”有唯恐逆袭不成者,出言补充。

我正听得热血沸腾,K小姐却及时泼过来一盆冷水:“你听听就好,不要当真。谁家会把订单白白让出去?谁家会傻乎乎把底牌亮出去?场面话而已,临到利字当头,各家打的只能是各家的算盘。我刚做市场的时候,便信以为真吃过大亏。”

意料之外,这次银行招标竟然全部流标了。原因似乎很简单,所有投标的黄金公司都没有接受银行给的底价。更有刚烈的企业,与银行现场僵了局,闹了一个不欢而散。如此,自然殃及了我们这些池鱼。

“你知不知道这次APEC会议准备的三件国礼是什么?”我们刚刚离开北京,K小姐便出言发问。

“《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繁花》手包套装以及《和美》纯银丝巾果盘。”我张口便答。

“咱们要是能多接一些这样不仅附加值高还可以流芳传世的订单该有多好!”K小姐叹了一口气,一脸的疲惫。我当然知道她想要表达的意思,哪怕不是贵为国礼,只要我们无需放低身段为一毛几分的加工费争个高低,便也扬了眉吐了气。可是,行业的有趣和残酷,也正在这里。

(本文作者供职于某大型黄金企业,著有长篇小说《国家利益》和《女人花》)

【风过留痕】

□王佐良

打电报,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可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打电报曾经是必不可少,也是很难的事情。

在去农村插队之前,我只听说过打电报这件事,却不知道怎么打电报,也从来没有打过电报。插队以后,写信成了与家里联系的唯一方式,因为信可以到公社去邮寄,虽然不知道投递信筒的信邮递员什么时候来拿走、什么时候到家,反正一封信寄出去,过个月收到回信,那是很正常的。好在农村的生活节奏很慢,个月,实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遇到急事呢?那就要打电报。公社有电话,但知识青年是决不能用的,况且,那样老而又老的摇把子电话,能打到上海吗?那时候上海的里弄和新村一般有传呼电话,所谓传呼,就是一家烟杂店里有一部收费电话,店主人接到来电,告知对方是传呼电话,让对方的人说出接电话的人在哪个新村或弄堂、门牌号码、几零几室,叫什么名字,店主人上门去叫人来接。这来回一趟,时间很长。反正,在农村七年,我没用过公社的电话。

有一次,我却真遇到了

当年打电报的故事

要打电报的急事。

一天,我路过公社,在街上遇到公社的刘干事,他告诉我,你们上海知青,桥头大队的小汪被招工录取了,你叫他赶快回来,到厂里去报到。我一听,简直是十万火急,因为小汪正在上海看病,公社又没有邮电营业点,要打电报,只有翻山越岭,到邻县黄屯镇的邮电所。

我立刻四处打听小汪的家庭地址,我问和他在同一大队的知青家驹,家驹说只知道他家在哪条弄堂,不知道门牌号码。一连几天,我向生产队请了假,到处打听可能知道的人,都没有结果,最后去了岳山大队,才从小蒋那里知道了他家的详细地址。得到了地址,我赶紧出发,因为已经是星期六的下午,明天人家邮局不上班,要是拖到星期一,说不定就耽误了,那可是人家天大的事情!我翻山越岭地赶了十多里路,到了黄屯镇,找到邮局,要了一张电报纸,因为第一次看到电报纸复杂的格式,填写时有点战战兢兢。在营业员的责任和涂涂改改中,填写到第三张才过关:汪××接公社通知你已被招工录取请于×月×日之前到县

农机厂报导王佐良。电报的电文是不能有标点的,文字必须简洁,意思一目了然,我是一边在山上走,一边脑子里在想怎么拟电文、怎么写地址、怎么署名……因为时间紧,也因为心情激动:终于又有一个知青要离开这里,到工厂去工作了!我把“报到”错写成了“报导”。

付了钱,电报发出,我几天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长嘘一口气,我又赶紧回村里去,好几天没上工啦!接下来的几天,我盼着小汪回来的消息,天天到邻村的小吴那里打听,小吴没好气地反问,你急什么?又不是你招工!

很多天过去了,终于等到小汪回来的消息,见到他,他竟然闭口不提电报的事,我甚是疑惑,怎么他一点也不急呢?一打听,原来他对自己要去的工厂不满意!天啊!进工厂,是每一个知青的梦想,这样的好事轮到他,他倒摆起架子来了!小汪到底是在没去那家工厂报到,而是在队里呆了很长时间,后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到了巢湖维尼纶厂。不过,更让我意外的是,几天以后,小吴不见了,原来,他去了县农机厂。

过了几年,我也进了工

厂,恰好跟小汪在同一个城市。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小汪,他无精打采,有时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捂着肚子,说厂里如何如何不好。我说,你们厂还不舒服吗?建了这么多年还没建成,你们拿着工资闲来荡去……他摇摇头,叹口气,原来,他又对自己的工种不满意。

独生子,天生的脾性,你

有什么办法?

小汪原来插队的桥头大队离我的村子有十多里,有一次我去他那里串门,却发现他脸色蜡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问,才知道他得了胆道蛔虫病!这可是一个能疼死人的病,天晓得他怎么得了这种病!他有气无力地说,你要吃饭你就自己做。到他的灶边一看,我就全明白了,那上面的一切都脏得不能再脏——锅碗瓢勺若干天没有洗刷了!于是我赶紧动手,把它们上面黏结的东西使劲刮下来,然后一遍一遍地清洗,然后擦锅台,然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当年插友们的消息了,不知小汪尚能饭否?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翻译家)